

橘

洲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七、老人家最后清醒时，还在念叨要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

2005年3月19日的清晨，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不足百字的简讯，标题“葛振林病危”5个字，像5发子弹击穿了我的心脏。我放下报纸，尽管自己年近七旬，且患有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立即收拾行囊，踏上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旅程。

3月21日上午9点20分，当我踉跄着冲进衡阳解放军169医院走廊时，首先看到的是葛老的老伴王贵柱大姐红肿的双眼。这位与葛老相伴六十年的老人，正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军用毛巾。“从去年11月入院，这已经是第四次病危了。”她的声音像秋风吹过枯叶，“前三次他都挺过来了，昨天还说要给向阳小学的孩子们改演讲稿……”

葛老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两眼紧闭，鼻孔里插着呼吸管，额上敷着一块毛巾，只露出鼻孔和嘴巴。王贵柱大姐低着头叫了声：“老葛，谭作家看你来啦！”葛老没任何反应，显然昏迷着。王贵柱大姐让我看清葛老的脸部，把敷盖在额上的毛巾揭开，其面容与我以前熟悉的面容完全不一样了。原来，他颧骨颇高，脸长而瘦，现在见不到颧骨，两颊红润润的，胡子刮得光光的，嘴唇也红润，这位我不解。王贵柱大姐说：“从凌晨开始就这样，医生说，这可能是回光返照。”

我俯身在他耳边轻唤“老营长”，葛老的睫毛似乎颤动了一下，我多么想在这里多站一会啊，但医生不允许，我双眼滚着泪水，依依不舍地离开病房。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表示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临别的时候，我站在他的病床前，举起右手，恭恭敬敬向他行了最后一个军礼。

葛老的长子葛长生坚持开车送我至车站。他那辆老桑塔纳的后座上，堆满全国各地孩子们寄来的千纸鹤和图画。“父亲上个月去永州作报告回来就咳血，却连夜修改了上百份学生来信的批语。”在等红灯时，这位铁血军人突然崩溃痛哭，“老人家最后清醒时，还在念叨要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的事安排好了没有……”

离开衡阳169医院回到怀化仅10个小时，葛长生打来电话：“父亲11:11走了。”虽然心里早已做了葛老挺不过这一关的准备，但是，噩耗传来，我还是震惊不已，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湘江落泪，狼牙山呜咽，老英雄走了，但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五、“老首长，管仓库和管部队都是为人民服务嘛。”

英雄也是人，各有各的喜好。葛振林的喜爱是抽烟和下象棋。葛老家里到处是象棋，有木质的、塑料的、瓷质的。他脾气倔、个性强，下棋和打仗一样，喜欢打胜仗。有客来访，下棋招待是免不了的，赢了哈哈大笑，输了吹胡子瞪眼睛。

1979年夏，原广州军区组织一批人赴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老营长葛振林是其中一个。瞻仰结束后乘车返湖南途中，葛振林正用蒲扇拍打着车厢里凝滞的热浪。当列车临时停靠新乡站时，停下来的车厢里闷热难当，老英雄走下来，想到外面透透气。站台一侧有树，有人在树下下象棋，这可把葛振林给吸引住了，他大步走了过去观战。这一观不要紧，忘记了时间，列车启动了，把葛振林丢在站台上。站台上突然空荡荡时，老英雄才发现自己仅着一顶旧军帽加背心短裤，行李证件全在疾驰的列车上。他赤脚跑到站长室的模样，活像田间迷路的老农。站长问他叫什么名字，葛老答曰：“葛振林。”站长一惊：“是不是狼牙山五壮士葛振林？”葛老点点头。眼前这个皮肤黝黑、脚趾还沾着泥土的老人，竟是亿万中国人交口相传的抗日英雄！站长高兴地说：“想不到今天能见到老英雄，真是荣幸。”站长亲自将葛振林送上一趟车。

1983年深秋的北京，银杏叶铺满了八一大道。聂荣臻元帅在军事科学院家中设宴接待时任衡阳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的葛振林。1941年狼牙山阻击战期间，聂荣臻作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亲自签发命令授予葛振林等五人“狼牙山五壮士”称号。当聂帅听葛振林说起是衡阳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离休时，聂手握看葛振林的手突然一紧：“什么？你只是衡阳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茶杯在茶几上微微震动，葛振林却笑着搓了搓膝盖上的补丁：“老首长，管仓库和管部队都是为人民服务嘛。当年跳崖活下来，本就是赚的命。”

老英雄对国家大事，始终带着无限深情关注。1997年3月的衡阳，春寒尚未退尽，我到衡阳去看他。我们坐在小窗户外谈到7月1日是香港回归的大喜日子。老英雄高兴地说：“只要是中国人，谁都关注香港回归。我真想去香港看看。”他起身提笔写下“盼望香港回归”时，狼牙山幸存者特有的握枪姿势让竖笔如刀劈斧斫，而“归”字最后的捺脚却温柔收束——这恰似他的人生：前半生是宁折不弯的战士，晚年成了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慈祥祖父。署名时的日期“1997.3.26”微微倾斜，仿佛承载不住八旬老人澎湃的心绪。回家后，我写了《老英雄盼回归》一文发表，多家报纸转发，香港《大公报》亦做了转载。

六、用脚步丈量200多所学校，成为传递红色火种的“编外教师”

离休后的葛振林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关心青少年成长上，多年来用脚步丈量200多所学校，成为用生命传递红色火种的“编外教师”。

他认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关心他们就是关心祖国的未来、关心党的事业。当时领导邀请葛老担任衡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名誉会长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且担任了多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葛老经常到各地学校为孩子们讲战斗故事，讲革命传统，谈人生理想。此外，他还应邀到10多个省、市的机关、学校和部队作报告，讲革命传统故事，累积作报告600多场，听众达30万人次。

葛振林每到一处讲学，都会先宣讲他的三条规矩：一、不准搞吃请；二、讲课不取报酬；三、不准用小车接送。离得近的他直接走去，离得远的坐公交车，他的这三条规矩”当时在师生们中广泛颂扬。

葛振林还经常给困难学生送学习用品。曾多次前往衡阳市聋哑学校，通过写字板与听障学生交流抗战故事。尽管沟通方式受限，但他坚持每学期至少去两次，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战斗经历，让这些孩子也能感受到红色精神的力量。在聋哑学校走访时，他发现部分学生因家庭困难缺乏学习用品，便定期送去铅笔、橡皮等物资。有次看到学生用破旧的笔记本，他立即联系军分区干休所的老战友们集体捐助了50套文具。老英雄以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教育不应因身体差异而缺席。

在衡阳市实验小学，孩子们都记得葛爷爷讲课时生动的样子。他会突然拍桌子模拟枪声，会蹲下来演示如何匍匐前进。当讲到跳崖那一刻，教室里总是鸦雀无声，有的孩子忍不住抽泣。但葛振林从不渲染悲伤，他总是说：“同学们要珍惜现在的好时光，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老英雄用一生的自律证明：共产党员的价值不在衔级高低，而在脊梁是否挺直如松柏，是否始终向着人民的需要生长。

三、讲完狼牙山的故事，他的嘴角微微颤抖，眼神变为深不见底的哀伤……

在那个众所周知的特殊年代，我和老营长葛振林一度失联。写给他的信，无一例外被退回，看着信封上用红色笔写的“查无此人”四字，我心如刀绞。

1978年，我四处打听葛振林的下落，终于打听到：老营长在湖南省军区衡阳警备区，担任后勤部副部长。我立马启程，从偏远的怀化辗转来到警备区所在的黄茶岭。傍晚时分，我注意到有一位头戴洗得褪色的黄军帽、身着褪色的黄军装的老人。尽管岁月改变了容颜，但那瘦高的身形和坚毅的侧脸，让我瞬间认出：这就是我日夜想念的老营长！

失联多年后重逢的那晚，老营长葛振林与我秉烛长谈，破天荒地给我讲述惊天动地泣鬼神的狼牙山血战——

“我是1917年生的，老家在河北省曲阳县党城乡喜峪村，我们那个地方很贫穷，十年九旱。8岁那年，母亲离世，为了活命，不得不给地主家放羊。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很快踏进了我们曲阳，我曾亲眼看到日军在邻村的暴行：男人被活埋，妇女遭凌辱，烧杀抢掠……那叫一个悲惨啊！于是我萌生了参军打鬼子的想法。那年我21岁，找到八路军招兵的干部。招兵干部打量了我一会，问我怕不怕。我说：“怕死就不来了！”就这样，我当了兵，被编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

“当时的班长马宝玉经常给我‘开小灶’。一次实弹射击，5发子弹打了48环，全连第三。班长马宝玉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打鬼子就要这样的枪法！’”

“1941年秋，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铁壁合围’大扫荡。9月24日深夜，我们七连连长刘福山接到紧急命令：日军3500余人正向狼牙山地区合围，七连负责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我们驻扎的狼牙山洞穴密布，是八路军储藏物资、隐蔽伤员的重要基地。25日凌晨，已经完成掩护任务的七连准备撤离时，发现一股日军正沿小路包抄而来。连长刘福山当即决定留下我所在的六班阻击敌人，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连指导员蔡展鹏调交代我们六

班：‘你们在山上掩护要争取让地方的同志和群众走得更远一些，让连队主力安全地突围出去。’”

“此时我们六班其实只有五人：班长马宝玉、我、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接受任务时，马宝玉代表我们五人向连长保证：‘只要我们在，鬼子就别想过去！’”

“最后撤离的战友把仅剩的几颗手榴弹都留给我们六班，把手榴弹绑成捆，做成‘集束手榴弹’，然后埋在路口。当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时，班长一声令下，我就引爆了‘集束手榴弹’，十多个鬼子应声倒地，鬼子军以为遇到了我方主力，立即组织强攻。我们前后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激战至中午，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摆在我们五人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主力转移方向，追上主力部队，相对安全；另一条是通向狼牙山棋盘陀顶峰，是条绝路。班长马宝玉和我商量，为了不暴露主力部队转移的方向，把敌人的主力部队牵制住，我们毅然决定走向顶峰——他们要像磁石一样吸住敌人。”

“敌人以为我主力部队向顶峰方向转移，向峰顶奔来。我们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石头也用完了，疯狂的敌人黑压压一片冲向山顶。我们五人决计不当俘虏，班长马宝玉率先砸掉手里的步枪，纵身跳下深不见底的悬崖，胡德林和胡福才也随即跳了下去，出于本能，我下意识挽住了我旁边的宋学义，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一起跳了下去，不承想崖上横着长出来的树枝把我们俩挡了一下，我们俩回弹开后又各自往下掉去。跳崖的时候，班长马宝玉还只有21岁，胡德林24岁，胡福才最大28岁，宋学义22岁，我23岁。后来，班长马宝玉和胡福才、胡德林都牺牲了，我和宋学义摔到崖底，幸免于死。”

老营长葛振林讲完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时，把略左偏的头转向我，屋内陷入一片短暂寂静。昏黄的灯光下，我看见的嘴角微微颤抖，仿佛在极力克制着什么，他的眼神变为一种深不见底的哀伤……

滋味，让我牢记在心。

“马班长他们呢？”回到部队，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团政委，政委摸着我的头，哽咽道：“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我听后号啕大哭。

在授予“狼牙山五壮士”称号的表彰会上，我摸着崭新的钢笔和记事本，眼前却浮现胡德林牺牲前的场景：这个山西农家汉子把最后的子弹留给我，自己抡起石头砸向鬼子时，吼的是“你枪法准，替俺多杀几个”……

百团大战攻打井陘煤矿时，我带着突击队冲进铁丝网，分明听见马班长在喊“注意机枪点”。那些牺牲的战友把生命化作了我的眼睛和耳朵……

最难忘是平津战役总攻那天。大雪中，我们连担任尖刀班，冲锋号响起时我嘶吼着三个名字冲出战壕。子弹打穿左臂那刻，恍惚看见马班长他们端着刺刀冲在我前面……

现在你明白了吧？每次作战地图上的红箭头，都是我们五个人未走完的路；每场胜利后的庆功酒，第一碗必须洒向狼牙山的方向。当我替战友们看着红旗插上天津城头时，才终于敢放声大哭。我的生命早就只属于自己，而是五壮士集体番号下永不熄灭的火种……

1986年9月25日，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举行落成典礼，葛振林与余药夫应邀参加。在纪念馆落成典礼上，主持人故意让葛振林从人群中辨认恩人，余药夫缓步上前时故意用河北方言问：“葛老，还记得俺不？”老英雄葛振林立刻笑答：“听口音就是你！”然后对着所有人激动地大声说：“这位，就是我和宋学义的救命恩人。”在场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仰望英雄

（报告文学）

谭士珍

20世纪5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狼牙山五壮士》在全国引起轰动。之后，“五壮士”的英雄故事又写进小学语文课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北京天安门阅兵式上，“狼牙山五壮士”英雄部队方队列入第一方阵……这些广泛而深入的宣传，让“五壮士”的英雄事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让我感到无比光荣和骄傲的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曾经是我的领导，也是我亲密的战友，我与他的交往长达70多年。如今他已离开我们2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他的谆谆教诲时常在我的耳边响起。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一个94岁的老共产党员，我感觉内心有神圣的责任感：要告诉每一个人，关于抗日英雄葛振林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狼牙山没带走我，荆江水更带不走！”

至今还记得74年前的那天，我第一次见到老英雄葛振林。

1951年初，我分配到湖南省军区独立16团1营当书记（秘书之类的工作，排级干部），当我得知营长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甭提有多高兴了！

报到那天，冒着冷气的晨雾还未散尽，一个瘦高的军人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他就是葛营长！当时葛营长刚刚从朝鲜战场负伤回国。

依稀记得葛营长伸手接过我调令的动作。受伤的左手在布条里蜷曲着，右手掌根有道疤痕，可五指展开依然能覆盖大半张公文纸。有一根枯草从木楼上落下，飘落在他缠着纱布的额头，他下意识用伤臂去拂，突然的疼痛让他眼角抽搐出三道皱纹，脸颊上赤裸的伤口抖了一下，可那对眼睛却格外犀利——左眼因头部伤势半垂着，右眼瞳孔里燃烧着奇异的光。下巴上有用剪刀修理过的痕迹，稀稀拉拉的乱胡茬，那些倔强的黑色线条，像极了狼牙山悬崖缝里挣扎着生长的野枣树。

我紧张地不知道说什么，只能拉直身杆“啪”地敬了一个军礼：“向营长报到！”

葛营长拍了拍我的左臂说：“小谭同志，欢迎欢迎！”1952年初夏，作为营部的文书，我随葛营长一起赴湖北藕池口参加伟大的荆江分洪。雨后的热浪裹着江水的腥气扑来，藕池口的堤坝上，葛营长受伤未痊愈的左臂被汗水和泥浆浸成黄褐色。军医反复叮嘱他不得下水，可当第三次洪峰预警传来时，他用受伤的手配合右手压在墙上将救生绳系紧在腰间，纵身跳进漩涡翻涌的导流渠。浑浊的江水立刻吞没了他的身影，受过多次伤的头和头上的军帽在水面忽隐忽现。我们在岸上拽着绳索，能感受到水下传来的剧烈晃动——那是他用受伤的手臂在扒开堵塞泄洪闸的树干杂物。当他终于被拉上岸时，军裤膝盖处磨出两个大洞，刚结痂的伤口创面又渗出了血。

葛营长吐了吐口中的泥沙，抚了抚满是伤疤的头，说：“狼牙山没带走我，荆江水更带不走！”

二、“如果我牺牲了，这是我攒着交党费的，是我对党的最后贡献！”

1952年立冬后不几天，伤愈后的葛营长又向军区申请加入抗美援朝战争中去。于是，我随伤愈后的葛营长英雄起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2年末的朝鲜战场已进入阵地战，坑道顶部的冰凌在炮击震动中簌簌坠落，葛营长就着半截蜡烛的火光写字，钢盔里衬的反光把他眉骨上伤疤和冻疮照得发亮。他停下写字，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给我，说：“小谭，如果我牺牲了，这是我攒着交党费的，是我对党的最后贡献！”说话间把刚才写的那张纸递给我，“这是我的遗书，给我保管好。”

揣着那葛营长从怀里掏出来的油纸包和那沉甸甸的遗书，重得像我双手揣了整个长津湖。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订。在协定签订之前，我们志愿军逐渐撤回中国境内，在随葛营长撤回时，在国境界碑边上，葛营长站在被炮火炸成锯齿状的界碑旁，七月的热浪裹着硝烟味扑来。他摘下磨出毛边的军帽时，右手在微微颤抖。远处被炮火削秃的山坡上，几株侥幸存活的小树在弹坑间摇摇晃晃。

他忽然蹲下，捡起半块炸碎的军用水壶，壶身上“赠给最可爱的人”的红字还剩半个“爱”字，汗水顺着他左颊的弹片伤疤滑下，在下巴悬成晶亮的一点，却始终没有坠落。当风吹散硫磺味的雾气，露出南方中国的轮廓时，他转身对着狼牙山的方向，喉动了动，嘶哑的嗓子发出气音：“老班长，咱们又打赢了。”

回国后，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我们部队阶段驻扎在湖南郴州。1953年9月，因我是军队文职人员，随后调入湖南省军区干部学校学习。临别前，葛营长来到我的宿舍，他瘦高笔挺地站在门口，阳光从他的头上一直铺到背上，从脖颈间漏出的几缕投到我的脸上，暖暖的。“拿着。”他别过脸去咳嗽两声，喉结在满是弹片刮痕的脖颈上滚动。我看到他军装第三颗纽扣松了线头——正是那个往常装党费和遗书的内兜位置。钢笔的金属部件与衣扣轻轻相撞，发出清脆的声响，他立刻用左手托住我的手腕，仿佛怕这件珍宝跌落。远处传来集合哨音时，他用钢笔尾端戳了我胸口：“小谭，你跟我快3年，现在要走了，我没有别的送给你，就送你这支跟我多年的钢笔，这是上级以前发给我的纪念品，你是文化人，以后写作要像打机枪那样，实打实地发挥它的威力……”

从此，这支带着葛营长体温的钢笔，比任何勋章都更沉重地坠在我胸前口袋里。我没辜负老英雄的期望，把主要精力放在写革命战争题材上，有反映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朝花》，多次印刷出版达200多万册；反映抗战敌后斗争的长篇小说《太行儿女》和《风雨故人来》连续出版；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女匪》，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用我——湘江河山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长沙晚报社 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联合出品